

## 地方菁英如何應對兵災？ 以1924年江浙戰爭的溫州戰場為中心

羅士傑\*

軍閥內戰乃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的縮影，但卻罕有以地方政治運作的觀點去探討不同世代與背景的地方菁英對地方兵災的因應之道。本文以地方社會研究的觀點，透過探討廿世紀初期的地方菁英是如何透過不同的路徑取得資源及運用不同的專才，來參與地方政治的運作，再聚焦於地方菁英於1924年江浙戰爭溫州戰場的兵災中的應對去進行探討。本文希冀透過重新解讀溫州地方文獻，解決以下問題：20世紀現代戰爭對地方政治運作到底造成怎樣的影響？現代型態的戰爭又是透過結合地方社會中哪些新的條件或人群，進而造成影響？地方社會出現的不同世代與人群組織，是如何應對這些變化？藉由討論1924年溫州戰場，又能如何反思20世紀以來，浙江與中國東南沿海地方政治運作的實態，及其所引發的討論問題。

關鍵詞：地方政治、地方菁英、齊盧戰爭、天主教會、黃光、呂文起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通訊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聯絡方式：shihchiehlo@ntu.edu.tw

## 一、前言

1993年出版的《平陽縣志》，對1924年夏末發生在縣境內閩、浙兩股軍閥混戰的過程，有以下描寫：

蘇、皖、贛、閩的直系軍閥聯合攻打皖系浙江軍閥盧永祥。……，八月廿二夜，兩軍開火，砲聲隆隆，……。廿五日，……，(浙軍)徐軍守兵遭襲退回東江山，閩軍追至大嶺背，即揚旗吹號，衝鋒而上。守東江山徐軍潰退至(平陽)縣城，廿七日又退往瑞安。(閩)彭軍整隊進入平陽城。<sup>1</sup>

寥寥幾百字的記載交代了這五天的歷程與閩勝浙敗之事，雖說此役造成的傷亡並不多，在以往強調「成王敗寇」與「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思維下，溫州此役可說是一場被遺忘的戰爭。透過地方歷史文獻的重建，此場軍事活動所造成的災害，的確對溫州與江浙兩省地方百姓日常生活造成相當大的衝擊。<sup>2</sup>本文希冀透過由下而上之地方史研究的視野，針對溫州地方社會中不同世代與不同背景的地方菁英是如何去應對此一人為兵災的討論，去揭示二十世紀上半葉東南沿海地區縣級地方政治運作的實態及其歷史變遷的意義。畢竟從溫州百姓的角度出發，他們對屢次發生的「兵災」並非無感。當時已退休在家的張桐(1860-1942)即為一例：

同治初逢甲子年，橫陽錢匪掃烽煙。不圖六十星周紀，又值三山兵擾邊。鬥士望風戈盡倒，將軍貪賄豁難填。淒涼令尹空城守，搜刮脂膏劇可憐。<sup>3</sup>

<sup>1</sup> 平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陽縣志》(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3)，頁543-544。

<sup>2</sup> 關於此一戰事對江浙兩省之社會面衝擊的討論，可見馮筱才，〈江浙商人與1924年的「齊盧之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臺北，2000.06)，頁183-241。對當時整體政局變化的影響，可見馮筱才，〈江浙戰爭與民初政局之轉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34卷第1期，(杭州，2004.06)，頁54-62。

<sup>3</sup> 張桐，張鈞孫等編，《張震軒選集之一：杜隱園詩文輯存》(香港：香港出版社，2005)，頁100。

詩中同治甲子年(1864)的「錢匪」，即為溫州金錢會起事，張的父親出面組織團練，從而於此一事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sup>4</sup>但也如張所感嘆的，一甲子後，百姓仍因軍閥爭奪地盤不得安居。與金錢會事件不同，此役參戰的軍人皆來自外地，與溫州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戰役落幕後，閩軍勝方逕往杭州與上海方向推進。但對當地人群而言，19世紀中葉以來，溫州地方菁英間也有招募傭兵對抗的傳統。<sup>5</sup>進入20世紀後，兵災的衝擊，除了戰火危及當地生態環境，與破壞日常生活秩序之外；<sup>6</sup>自外地而來的軍隊公然勒索財物，更是重要威脅。戰爭所費不貲，參戰雙方軍隊皆沒有地方連結，因此出現「將軍貪賄豁難填」的現象。這也迫使各界籌措更多軍餉與物資來應付兩方軍需，不然由兵變匪也僅是轉瞬之間。這也等於說晚清以來「地方軍事化」所引起的兵匪不分的問題，幾經變形，到了1924年仍是東南沿海地方社會的重要安全威脅。<sup>7</sup>

若說19世紀中的金錢會，象徵溫州地區城區與鄉間菁英對立的激烈化，<sup>8</sup>透過研究1924年的這一場兵災，又可從中揭示哪些重要的歷史變化？

<sup>4</sup> 關於溫州金錢會事件與地方政治關係的研究，詳見羅士傑，〈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臺北，2012.03)，頁159-202；劉錚雲，〈金錢會與白布會——清代地方政治運作的一個剖面〉，《新史學》，第6期第3卷(臺北，1995.09)，頁63-94。

<sup>5</sup> 19世紀中葉以來地方軍事化的討論，詳見孔飛力(Philip Kuhn)，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針對個案的討論，可見Edward A. McCord,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sup>6</sup> 近年來出現一些關於20世紀初期軍閥主掌的政府，如何面對環境衝擊的討論，可參Pierre Fuller 針對1920-1921年間軍閥救災的討論，見Pierre Fuller, *Famine Relief in Warlord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sup>7</sup> 進入20世紀後，晚清以來各地私人勢力軍隊，因為軍餉而騷擾地方的例子不勝枚舉。相關討論可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書店，1980)。針對東南沿海地區的討論，如廣東地區，見何文平，《變亂中的地方權勢：清末民初廣東的盜匪問題與社會秩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關於同時間，福建省的討論，見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閩南民軍：福建民軍資料選編》(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01)。

<sup>8</sup> 關於金錢會事件背後，瑞安城區與溫瑞塘河、溫瑞平河地方菁英的不同村落人群對立升高的歷史過程，可見羅士傑關於溫州龍舟競渡的討論，見羅士傑，〈近代溫州的龍

對此，當時實際參與折衝各方的平陽縣地方菁英黃光(1871-1945)，<sup>9</sup>事後寫下這段饒富意味的文字：

聞孫馨帥援浙，<sup>10</sup>軍分三路，惟平(陽)最佳。衢、處及泰順各地，歡迎人士均吃大虧。吾輩得彭公(德銓)如此色相，<sup>11</sup>實出意外。事後追維，不覺心顫。<sup>12</sup>

如黃光指出：1924 年的江浙戰爭牽涉區域甚廣，除了濱海的舊溫州府的平陽縣以外，在閩浙交界的山區衢州、處州與泰順等地，雖也有地方官吏、菁英出面與軍隊折衝，但都無法如平陽縣一樣全身而退。何以有濱海貿易之利，經濟更為富庶的溫州可倖免於難？真只是因為碰到一個仁慈、不糜爛地方將軍的運氣？如下文將揭示：溫州之所以可以平安地度過這一場兵災，實因進入 20 世紀以來，不同背景的地方政治實力者間的合作，方可獲得博弈與抗衡的機會。

本文希冀透過地方的現代史的視角，重新理解 1924 年江浙戰爭對溫州地方政治造成的影響，預期討論的問題如下：首先，20 世紀的戰爭對地方政治造成何種新衝擊？地方社會中那些新的條件或人群，又在此類衝擊中發揮作用？地方社會不同的人群組織，特別是天主教的宗教組織，是如何

---

舟競渡與地方自治傳統》，《歷史人類學刊》，第 17 卷 1 期(香港，2019.04)，頁 31-65。

<sup>9</sup> 關於黃光，可見游壽澄，〈黃梅僧和他的《話劫錄》〉，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平陽：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第 9 輯，頁 36-49。

<sup>10</sup> 孫傳芳，字馨遠，故又名馨帥，山東泰安縣人。1904 年畢業於北洋陸軍速成學堂，1908 年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1909 年歸國擔任北洋陸軍教官，官至旅、師長，後為直系要角。1923 年孫傳芳率軍進入福建，被北洋政府任命為福建軍務督理。1924 年閩浙戰爭後，孫進據杭州，並接連取得安徽與江西兩省之控制權，後來於南京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為孫氏一生之最高峰。北伐後，孫氏兵敗下野，後成為虔誠的佛教徒，1935 年孫於禮佛時遇刺身亡。陳錫璋，《細說北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 215-218。

<sup>11</sup> 彭德銓，北京人，出身行伍，為直系孫傳芳部屬，曾任福建陸軍第一混成旅，在浙江、江蘇、福建等地征戰。李盛平，《中國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頁 661。

<sup>12</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頁 400。

應對這些變化？<sup>13</sup>透過對 1924 年江浙戰爭溫州戰場背後地方政治競爭的討論，我們可以如何還原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實態，並從普通百姓的視角反思，20 世紀以來國際競爭與地方政治發展中所扮演之重要性的討論。本文將揭示：自 20 世紀以來活躍於溫州地方政壇的不同世代的官員與地方菁英，由於結合不同世代與甚至是不同國籍的政治與財政資源，其間形成結盟關係，從而可以有實力和平地為地方百姓處理這一場兵災。換句話說，這群位處東南沿海的地方菁英充分體現了「保護型經紀」在廿世紀初東南沿海地方政治中所展現的實力與運作形態。<sup>14</sup>

## 二、19 世紀末以來的天主教會與溫州地方政治

天主教會對 19 世紀中以來地方政治造成的衝擊，前人已經有很多討論。<sup>15</sup>20 世紀上半葉，是天主教會與溫州地方政治的轉型過程。曾任職於溫州市宗教事務局的鄭頡鋒，將調停 1924 年的兵災列入民國時期溫州天主教會的三大善事：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當溫州人民遭到嚴重水災、兵禍、時疫，天主教徒不顧個人安危，盡力救助。其中主要有下列三事：(一)民國元年、九年、十八年等幾年，浙南暴雨成災，溫州天主教會皆為社會當前急難而出力。……民國十三年九月間，閩浙軍閥混戰，……溫州道尹邀請天主教馮烈鴻(Cyprien

<sup>13</sup> 對 19 世紀至 20 世紀基督宗教由入侵到本土化的過程，D. E. Mungello, *Catholic Invasion of China: Remaking Chinese Christianity*(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值得參考。

<sup>14</sup> 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特別是第二章關於經紀統治的討論。

<sup>15</sup> 關於天主教會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多是圍繞 1900 年義和團事件的北方地方社會來進行展開。見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著，郭偉全譯，《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陳方中，《崩落天朝的天國子民：義和團時期的直隸天主教會》(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17)；李曉晨，《近代河北鄉村天主教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Aroud, 1876-1949)神甫同往調停，<sup>16</sup>……。(三)公元1929年夏、秋之際，霍亂病在溫州流行，……，地方士紳與天主教會租借場地建立臨時醫院。<sup>17</sup>

據天主教溫州教區前主教朱維方(1927-2016)等人的研究，1869 年左右，天主教會由台州重新回到溫州樂清的沿山地區，之後逐漸拓展到溫州府全境。1876年 11 月，天主教會買下溫州城內周宅巷天主堂現址。1877年 11 月，影響晚清溫州地方政局甚鉅的義大利籍神父董增德(D.Y. Procacci, 1850-1922)，開始常駐溫州。1880年 12 月，溫州成為天主教寧波教區下的正式本堂區。該區因信仰人口的增長，1903年晉級為總堂區。1911年增置平陽本堂區，兼管瑞安教務。1928年樂清濱海的虹橋與永嘉山區的楓林設立本堂區，1930年瑞安城關的東門、1932年平陽的錢庫鎮，以及玉環島上的坎門等偏遠地方也都建立本堂區。據 1936 年的統計，全溫州教區登記的天主教徒共有 30,342 人，占整個寧波教區信徒的 67%。歷經幾任神父一甲子的努力，天主教會在溫州奠下深厚的人群基礎。<sup>18</sup>

天主教傳教方式與基督教類似，早期都是透過提供物資與慈善服務，以吸引普通百姓。在建立與地方人群的信任關係後，教會組織自然就會成長茁壯。教會的發展／傳教並非一帆風順，在與東南沿海地方社會不同宗教傳統競爭與交融的過程中，曾產生不少「教案」。溫州發生過數起重大

<sup>16</sup> 法國里昂市人，法國遣使會傳教士，1899年被派遭到溫州地區傳教，1928年因眼疾返法。見黃漢，〈法國遣使會司鐸馮烈鴻的溫州生涯〉，《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第34卷第3期(長春，2015.03)，頁48-49。

<sup>17</sup> 鄭韻豐，〈溫州天主教會三大善事〉，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第3輯，頁123-126。關於溫州天主教自述的發展歷史，可見朱維方，《溫州天主教簡史》(溫州：溫州天主教區，2006)。

<sup>18</sup> 浙江省天主教傳播歷史，見郭慕天編著，《浙江天主教》(杭州：《浙江省宗教志》編輯部，1988)，頁98-100；《浙江省宗教志》編輯部，《浙江省宗教志資料彙編》(杭州：《浙江省宗教志》編輯部，1993)。溫州的狀況，見朱維方，《溫州天主教簡史》；方志剛，〈溫州天主教的起源〉，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第7輯，頁339-342。

教案，分別為 1884 年的甲申教案<sup>19</sup>及 1900 年的神拳會事件，<sup>20</sup>這兩起教案的背後，除了地方政治勢力間的角力外，當時國際政治競爭也對地方社會造成影響。例如，甲申教案與 1882 年的中法戰爭有直接的因果關係。1900 年的神拳會事件，雖與北京的義和團運動沒有關連，但研究兩起教案，可以了解鄉民已普遍接受外國傳教士及教會人群組織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亦即提供與「販賣」保護的重要政治機制。此現象逐漸侵蝕與稀釋了地方士紳長久的政經壟斷利權。兩廂對峙下，終究導致神拳會的武裝衝突事件。除了運用地方人群政治競爭的角度，重新觀察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溫州百姓，如何透過自己的方式去結成組織並發揮政治作用。更重要的問題是，經過兩次重大教案的洗禮，20 世紀後的溫州天主教會以及他的信徒人群們，又是選擇並經歷了哪些變化，方可維持與擴大之後在地方政治領域中的影響力。

對於這一個問題，可用一張 1903 年 6 月間官員與傳教士的合照來說明(見圖 1)。照片拍攝的背景是，寧波教區的法國趙保祿主教(Paul-Marie Reynaud, 1854-1925)前往溫州做壽後，與溫州府的重要文武官員於周宅祠巷天主堂神父樓前合影。<sup>21</sup>中座披著龍紋勳章者為趙保祿，前排左起的官員為：永嘉知縣秦國鈞、溫州鎮總兵劉祥勝，趙保祿主教、溫處道臺童兆蓉(1838-1905)、溫州府知府王琛。後排左起第二為法籍處州教區神父戴思綸(1875-1921)、第

<sup>19</sup> 關於甲申教案與拳民運動的資料，可見張憲文輯錄，〈甲申教案及拳民運動的幾則史料〉，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第 9 輯，頁 226-239。關於甲申教案的研究，見 Roger, Shih-Chieh Lo (羅士傑), "The Order of Local Things: Popula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Modern Wenzhou, 1840-1940" (Providence: Ph. D. dissertation, Brown University, 2010), ch.3 "Wenzhou and Christian Impact: Harbinger of New Political Order (1870-1900)".

<sup>20</sup> 教案背後的民間邏輯與地方政治的研究可見羅士傑，〈大眾組織與晚清地方政治——以 1900 年浙江溫州的神拳會事件為討論中心〉，《新史學》，第 28 卷第 2 期(臺北，2017.06)，頁 187-224。

<sup>21</sup> 趙保祿主教對浙江天主教會的影響，可見李東華，關玲玲、楊宗霖編，《一個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 125-126。

四為溫州教區法籍神父馮烈鴻。<sup>22</sup>可見府城內重要文武官員皆親自到場為趙主教慶生，趙的影響力以及與官方的合作關係可見一斑。



附圖 1：趙保祿主教與溫州府地方官員合影

資料來源：李震主編，《溫州老照片 1897-1949》（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30-31。

趙於 1884 年至 1925 年擔任寧波主教，任內曾七度到溫州府視察，並主持重要儀式。主教視察教區短則一個月，長則三個月。趙的足跡遍布溫州府各地，許多清帝國官員不曾探訪的偏遠堂口也有他的足跡。有一說他在視察途中，共接受了 24 頂來自民間捐獻的「萬民傘」，可知他在百姓生活中的正面形象。<sup>23</sup>趙在寧波平時出入的排場與地方官員無異，過生日時，寧紹台道臺也會親往祝壽。當時浙江民間流行一句話：「寧波道一顆印，不如趙主教一封信」，足見天主教神職人員在地方政治領域與清帝國官僚分

<sup>22</sup> 溫州傳教士的簡歷，可見鄭頡峰，〈近代前來溫州的外國傳教士〉，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4）第 17 輯，頁 189-196。

<sup>23</sup> 萬民傘乃是舊時地方百姓歡送政績卓著之卸任官員所用，屬於京劇文化的一部分。見黃鈞、徐希博編，《京劇文化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1），頁 90。



庭抗禮的政治現實。<sup>24</sup>事也有例外，1901年童兆蓉任溫處道後，因為堅持對1897年間的瑞安楊茂奶教案「一罪不再二罰」，因此與趙保祿多有交鋒，但最後還是以趙的退讓收尾。<sup>25</sup>兩人或說兩股勢力交手的過程，如《清史稿》有云：

（光緒）二十六年（1900），擢浙江溫處道，先署杭嘉湖，明年乃之任。值拳匪亂後，瑞安民楊茂奶與教堂積衅。浙東法國主教趙保祿尤橫，挾兵船至溫州，必欲殺楊。兆蓉力爭曰：彼法不當死，我不能殺人以媚人。卒拒之，以此名聞。<sup>26</sup>

從圖一也可見，童兆蓉出席了趙保祿的祝壽典禮，兩年後童卒於任上。<sup>27</sup>趙則於1925年卒於巴黎，遺棺由法國政府照會北京安葬於寧波。1932年，法國政府授趙保祿十字勳章，其時法國軍艦還駛入甬江，並在寧波舉行授勳大典，由法國海軍擔任儀仗隊。<sup>28</sup>一直到20世紀中葉，法國及天主教在浙江仍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

進入20世紀後的溫州天主教會，何以能擺脫民教衝突的暴力陰影，並逐漸進入地方化的發展，法籍馮烈鴻神父居功厥偉。馮於1899年9月的壯年之際到溫州傳教，1900年任副本堂，1902年任溫州本堂，1903年溫州本堂管理範圍擴大到溫州與處州（今浙江省麗水市）兩府教務，直到1928年馮才因嚴重眼疾返回法國就醫。如朱維方指出：馮領導下的溫州教會任用得人又有穩定的捐款，得以快速發展。任用得人方面，馮神父仰賴台州出身的

<sup>24</sup> 蔡鋼鐵，〈趙保祿主教在溫二三事〉，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3）第15輯，頁44-47。

<sup>25</sup> 馮堅，〈溫處道童兆蓉〉，收入潘善庚主編，《歷史人物與溫州》（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頁196-198。童寫給趙的兩封信，可見於清·童兆蓉，《童溫處公遺書》（民國寧鄉童氏椿蔭書屋刻本）第6卷，現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sup>26</sup> 清·趙爾巽，《清史稿》（臺北：鼎文，1981），卷451，頁12571。

<sup>27</sup> 童兆蓉在《清史稿》中有立傳，見清·趙爾巽，《清史稿》（臺北：鼎文，1981），卷451，頁12571。

<sup>28</sup> 蔡鋼鐵，〈趙保祿主教在溫二三事〉，頁46。關於法國與天主教的關係，可見方豪，〈三十年來的中國天主教〉，收入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2536-2539。

徐輔賢神父，有效減低了與地方社會的隔膜。<sup>29</sup>除此之外，馮神父也致力於重建天主教在當地百姓中的道德權威：

馮公在任時，溫州出了個有名的教友，別號叫餽餽金，此人依仗外國神父勢力幹了不少欺人的事，馮公辨明是非在堂門口張貼聲明：教會是慈善機關，餽餽金的不法行為，全由他個人負責，與教會無關，並加了粗鐵絲框，人人瞧了，非常敬佩。<sup>30</sup>

這等於說，馮神父透過對教會成員的自清自律，解決了困擾地方已久的「教民」問題。馮也正面地回應 20 世紀以來溫州地方求新求變的社會風尚，獲得新一代溫州人的好感。1911 年辛亥革命後，溫州軍政分府頒發剪辮令後，許多自命進步人士持剪刀在城區各地強行剪去行人辮子。一個下午，溫州城內據稱強行剪去 500 多條髮辮。馮有反應如下：

在溫州傳教的法國神甫馮烈鴻看到這個剪辮場面，曾與他的廚師開玩笑說：你去買一批辮子來，把它保存二三年，就可發財。廚師不解反問：我保存二三年後賣給誰？馮烈鴻說：西洋婦女生傷寒病後頭髮脫落，那時……。話未說完，逗得大家都笑開了。<sup>31</sup>

對此剪辮亂局，馮的幽默與開放態度緩解溫州教徒對新局勢的焦慮不安。此外，張桐對以往被地方文人視若「采生折割」<sup>32</sup>與「汙穢不堪」的天主教會內部，有以下描寫：

(1916年)一月四日(農曆十一月廿九)聞周宅巷天主堂極其熱鬧，遊人來往如織，乃亦信步往觀，入內則見通樑燈綵，中堂掛繡金大壽屏，正桌上供大壽桃一座，上交叉懸五色各國小旗，下鋪五彩地毯，左右交椅均披大紅緞褥，

<sup>29</sup> 徐神父擔任副本堂，據稱處世謹慎精明外，也善繪畫，溫州本堂的聖堂圖像、祭臺祭披均出他手。謝擁三，〈周宅祠天主教堂概況〉，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第7輯，頁336-338。

<sup>30</sup> 朱維方，《溫州天主教簡史》，頁14。

<sup>31</sup> 佚名，〈辛亥革命剪辮趣聞〉，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10)第22輯，頁324-326。

<sup>32</sup> 「采生折割」為地方社會對天主教會傳播最廣的謠言與最深的畏懼，還曾因衝突引起教案。蘇萍，《謠言與近代教案》(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陳方中，〈天津教案再探〉，《輔仁歷史學報》，第11期(北縣，2000.06)，頁133-160。

蓋外國主教於此日祝壽故也。又進左首廳內，見四壁均嵌玻璃大棚，內襯油畫約數十架，皆畫耶穌自釘十字架成道以後之故事，維妙維肖，精神如生，洵西國之名畫也。<sup>33</sup>

這一場祝壽典禮，與其說是天主教神父舉行的生日派對，不如說是天主教會的開放日(open house)，許多溫州居民得以自由進出參觀，拉近天主教會與一般百姓的距離。我們可看到一個已經高度地方化的祝壽儀式，與百姓向地方神明祝壽的儀式相比，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依此邏輯，天主教會透過舉辦這開放式的祝壽儀式，向溫州各界展現亟欲嵌入社區生活脈絡的努力以及雄厚的地方實力。

為何馮主政下的溫州教區能有如此榮景，除了馮本人所發揮的領導功能外，主因馮獲得來自法國的穩固財政支持。馮的大哥博多祿神父在法國組織了「溫州傳教良友會」，替溫州教區募集到大量資金，加上馮創設的溫州董若望醫院院長類斯大姆姆(原文名，生卒年不詳)的捐款資助。<sup>34</sup>馮也持續推動地方慈善活動，為各新堂區建造教堂和神父住宅，並附設學校培養傳教人才。值得一提的是，馮神父因接收了大量來自法國兄長的募款，為達捐款徵信之用，他在法國《遣使會年鑒》和寧波教區的《簡訊》上，以家書的形式向法國捐款人報導溫州教務的推動。<sup>35</sup>

<sup>33</sup> 張桐，張鈞孫點校、戴若蘭整理，《張桐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1687。

<sup>34</sup> 董若望醫院乃溫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的前身，由法國天主教仁愛會於1906年創立。董若望亦為法國遣使會傳教士，1890年因私入南昌傳教，遭到絞殺。馮烈鴻於1913年建立的醫院以他命名。醫院由仁愛會的修女管理，當地人俗稱為大姆姆，第一任院長即為法籍的類斯姆姆，地方上稱「白帽姑娘醫院」。見李晴霞，〈從董若望醫院到溫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的變遷〉，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5)第9輯，頁148-151。另見趙肖為等譯，《近代溫州社會經濟發展概況：甌海關貿易報告與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頁285-286。

<sup>35</sup> 多數家信以法文書寫，目前已經有少部分翻譯成中文。見馮烈鴻，薛紀權譯，張孝民校，〈溫州初印象：《傳教生涯：馮烈鴻神父的傳教日記選譯(1899-1928)》〉，收入方韶毅主編，《甌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第7輯，頁20-33。

### 三、1924 年的江浙戰爭與平陽地方社會

1924 年的江浙戰爭，又稱為齊盧戰爭或閩浙戰爭，是 1916 年袁世凱(1859-1916)死後，皖系、直系與奉系，對江、浙與福建三省支配權的爭奪。1923 年直系曹錕(1862-1938)以賄選取代徐世昌(1855-1939)擔任大總統後，控制上海的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1867-1933)轉靠奉系，並於 1923 年 6 月 27 日通電反對曹錕賄選。此後，各地直系軍事強人覬覦控制上海的利權(一說與鴉片利益有關)，積極準備對盧用兵。為此，英、美、法、日等國公使對北京直系政府施壓，要求直系不得對上海用兵。江浙兩地的地方菁英(特別是各地的商會會長)也在上海成立和平協會，仿照清末東南自保運動的經驗推動「江浙和平公約」、「皖浙和平公約」與「贛浙和平公約」。<sup>36</sup>這些為了避戰而謀和的努力，因各方的觀望，勉強達成維持危險平衡的狀況。這個危險平衡，直到孫傳芳(1885-1935)於 1924 年初取得福建政權方才發生變化。1913 年底到 1922 年 9 月，福建政務由李厚基(1869-1942)主政。<sup>37</sup>1922 年底，徐樹錚(1880-1925)策動李的旅長王永泉(1890-1942)，聯合中國國民黨東路討逆軍許崇智(1887-1965)，發動政變逐走李厚基。<sup>38</sup>面對逐漸倒向南方中國國民黨的福建，北京直系政府派出孫傳芳於 1924 年 3 月進入福州逼王永泉繳械，由孫擔任福建軍務督理。如此一來，江蘇、江西與福建三省的直系軍事強人，遂可集中力量對付浙江盧永祥，一起劍指上海。

<sup>36</sup> 郭劍林主編，《北洋政府簡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頁 1096-1112。亦可見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時期史話》(北京：三聯書店，1983)，頁 1345-1348。

<sup>37</sup> 李厚基，字培之，江蘇徐州人。1889 年任職於李鴻章衛隊，1890 年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1891 年任李鴻章衛隊管帶，並隨李出訪外國，1909 年赴小站參與新建陸軍之編練。辛亥革命後，因率軍前往鎮壓二次革命後，任上海吳淞要塞司令。1913 年率軍入福州，並任命為福建鎮守使，實際影響福建到 1922 年。李正中，《近代天津名人故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張憲文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 910。

<sup>38</sup> 徐樹錚入閩以及策動王永泉聯合許崇智逐走李厚基的過程，詳見陳錫璋，《細說北洋》，頁 135、226-227。關於許崇智，可見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國政局》，(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1924年9月3日，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對奉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發動攻擊，此役共分三路進行：上海滬寧鐵路沿線，為此役中心；浙北的宜興與長興兩地；閩浙之交(本文討論的戰場)。據紅十字會的報告，此役在上海附近，對上海、嘉定、寶山、金山、昆山、太倉、宜興等地造成重大影響，約有 1,706 人傷亡，<sup>39</sup>並造成難民潮，當地因此有「甲子兵禍」的共同歷史記憶。開戰十多天後，9月16日，浙江省警察廳長夏超(1882-1926)倒戈支持孫傳芳，<sup>40</sup>盧永祥被迫下野，離開浙江後東渡日本。孫部自福建進入浙江，出任浙江督辦，以夏超為浙江省長。約當同一時間(9月15日至11月13日)則為第二次直奉戰爭：奉勝直敗，直系之前掌控全局的局面被打破，加上馮玉祥(1882-1948)倒戈奉系，轉回北京發動兵變使直系遭到關鍵打擊。奉系張作霖與馮玉祥找回段祺瑞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三人邀請國民黨領袖孫文(1866-1925)北上共商國事，之後的北伐則已是後話。

相對軍閥混戰，回到 1924 年平陽縣的地方政治，則可見到地方菁英進行地方自治的努力。溫州府屬北京政權統轄，1928 年前平陽則是隸屬於溫州軍政分府甌海道下的平陽縣。平陽縣府的日常行政由縣知事統籌，下設民政、財政、教育三科(後又改為一、二、三科)，<sup>41</sup>搭配清末以來的地方自治機關縣參議會(後改為縣參事會)，及自晚清以來新政設立的自治機構如：縣教育會、縣農會，以及平陽商務分會主持地方公眾事務，這確立地方菁英

<sup>39</sup> 1923 年齊盧戰爭對浙江北部與江蘇境內的影響，可見池子華、郝如一，《近代江蘇紅十字運動，(1904-194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頁 97-114；池子華，《紅十字：近代戰爭災難中的人道主義》(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3)，特別是第 3 章「江浙戰爭與中國紅十字會的人道救援」。

<sup>40</sup> 夏超，見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纂，潘一平編，《浙江人物簡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下冊，頁 118-119。

<sup>41</sup> 蒼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蒼南縣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頁 171。

與地方官員共治的多元權力格局。<sup>42</sup>至於治安則由警察局辦理，<sup>43</sup>閩浙戰爭爆發前，當地僅有浙江督軍派遣的少量駐軍。總而言之，19世紀末以來由清帝國所推動地方自治的改革，積極地擴大了具有不同背景的地方菁英，如黃光等人正式地參與地方政治的機會。這樣的權力格局基本上也延續到辛亥革命後的溫州地方社會。下文針對此一兵災中，扮演了積極角色的不同世代的黃光(1871-1945)與呂文起(1855-1927)兩人進行細部討論。

黃光的父親為平陽縣庫房的地方胥吏，<sup>44</sup>經年積累的家資甚豐。但據稱黃對家業的經營不是很有興趣，1889年(光緒十五年)結婚後，黃在夫人萬全鄉五都庠生林鼎英長女林娟的協助下，振興家業。清末考取秀才後，黃家還有能力可以「出資賑飢」，並得到杭州省方頒發之「壓班補缺」資格，得以取得進身清帝國地方權力階序的候補資格。我們可以從黃光身上清楚看到晚清以來，由於教育制度與政治改革，從而驅動的「吏轉紳」與「紳轉吏」的歷史變遷。<sup>45</sup>隨著清帝國建立地方自治的制度，黃也隨之積極地投入地方教育的興革事業，先是創辦黃氏家塾，1904年又創辦務本學堂與毓秀女學兩所新式學校。1906年，自行剪去辮子的黃光循著劉紹寬(1867-1942)的步伐去日本考察半年。1912年，他接任平陽縣教育會會長之職，

<sup>42</sup> 平陽的選舉結果，見劉紹寬，符璋主纂，《民國平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31，選舉志四，版心頁19，頁306。關於晚清以來地方自治的討論，梗概可見沈懷玉，〈清末地方自治之萌芽(1898-190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臺北：1980.07)，頁291-320。沈懷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輸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臺北：1979.10)，頁159-182。

<sup>43</sup> 清末民初的警察制度建立過程，見王家儉，〈清末民初我國警察制度現代化的歷程(1901-1916)〉，《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臺北，1982.06)，頁301-366。

<sup>44</sup> 地方胥吏的研究，見蕭公權，張升、張皓等譯，《鄉村中國：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瞿同祖，范忠信、晏鋒等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sup>45</sup> 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應新制度的影響，地方多出現的「吏轉紳」與「紳轉吏」之現象，可見佐藤仁史，《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菁英與地域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成為地方政治的實力人士之一。<sup>46</sup>1924年，53歲的黃光出任平陽縣參事會<sup>47</sup>議員。之後他就是以參事會議員的身分參與兵災的調處工作。透過他針對1924年閩軍過境的日記：《甲子兵事日記》，可一窺此事對地方社會產生的影響，及地方社會對其處理過程的討論。

溫州戰場的狀況為閩軍彭德銓準備由閩北的福鼎縣，通過分水關、橋墩鎮往山區的泰順(今溫州市泰順縣)與沿海的平陽、瑞安、溫州、樂清一路經由台州前往杭州。浙軍的溫州防線則由郝國璽(1886-1938)負責。<sup>48</sup>在黃的日記中可見，9月3日直奉戰爭浙北戰場開打後，即有浙軍軍官前往平陽勘查。因協助安排食宿，黃與他們多有往來，也因派來的軍官出身平陽，雙方還可用當地方言「蠻語」交談，更感親切，從而更可獲悉彼此的真正心意。黃提到的一位張姓副官，對即將來臨的戰事有以下的評論：

此次戰事太無謂。以自己身命，替別人爭地盤，真不值也。然軍人以服從為第一要義，奈何？<sup>49</sup>

<sup>46</sup> 馬允倫，〈前言〉，收入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1-2。前往日本考察學制，黃光並非第一人。影響現代溫州教育制度建立的劉紹寬，於光緒三十年(1904)接受溫處道童兆蓉的委託，前往日本考察學務7個月，並據之撰有《東瀛觀學錄》一書。光緒三十一年(1905)4月，劉擔任溫州府學堂監督，6月參與孫詒讓之溫處學務分處工作。1912年5月，劉辭去溫州府學堂監督，改擔任平陽縣教育會會長。1917年專任浙江第十中學校長，1918年以學潮引咎辭職，之後專心於地方文獻的編纂工作。見〈劉厚庄年譜〉，收入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蒼南：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2001)第16輯，頁401-431。

<sup>47</sup> 民國十一年選舉，平陽選出劉紹寬等28名，又改參議會為參事會，由縣議員選出半數，於半數由現知事委任。關於民國時期平陽縣參事會的制度設計沿革，可見劉紹寬，符璋主纂，《民國平陽縣志》，卷31，〈選舉志四〉，版心頁19，頁306。

<sup>48</sup> 郝國璽，光緒三十一年(1905)考入雲南陸軍武備學堂，不久被保送至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該校前身為1903年直隸總督袁世凱所建立的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1906年後改稱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1908年參加浙軍，先後擔任浙江陸軍第一師師長、杭州衛戍司令。後加入國民政府軍並歷任山東、安徽、江蘇等地區重要軍職，1938年卒於任上。王曉天、王國寧主編，《湖南古今人物辭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頁651。

<sup>49</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379。

浙軍布署約五百人進入平陽，平陽知事熊鈞<sup>50</sup>協調將浙軍安置於平陽第一高等學校內，該校因此被迫停課，引起師生不滿。三天後(9月6日)熊鈞出面邀約平陽地方菁英劉紹寬、黃光、陳筱垞(1861-1938)、<sup>51</sup>商人張達甫、<sup>52</sup>阮伯陶(1874-1953)<sup>53</sup>等十餘人，隔日到平陽仙壇寺宴請浙軍軍官並討論接待事宜。<sup>54</sup>該日竟降下大雨，原本答應出席仙壇寺午宴的地方人士都以天候因素缺席。熊鈞動員地方士紳分擔接待軍費的布局被打亂，他寫信給黃光探詢意向，黃有回函如下：

軍事招待，自應幫忙；地方義務，敢不力疾！唯待遇軍隊，禮節宜優，務得歡心，不惜少費。稍一大意，即出毛病。乃頃晤軍官，談及招待，皆有微辭。不加注意，恐戰事一起，予以難堪。牛背眼光，憤無可釋，豈不貽笑！今日約宴仙壇寺，亦此意也。署中目前所用，盡可公開。將來報銷，照數列入，有何為難之可言？<sup>55</sup>

給知事的回信中，參事會議員黃光除了表達支持知事的意願外，但也證實了劉紹寬等人對平陽縣府的不信任態度。這也並不代表劉等人對此兵災危機只想袖手旁觀，繼6日流產的仙壇寺之會後，9月11日年近六十的劉紹寬出面邀集地方菁英商討辦理團練事宜。可見劉等人不是不願出資，而是不願分擔浙軍的招待花費。為何黃光兩邊都受邀，主要還是因：「平陽城區

<sup>50</sup> 熊鈞，字喬松，江西南昌人，1923年6月至1925年3月擔任平陽縣知事。蒼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蒼南縣志》，頁173。

<sup>51</sup> 陳筱垞，名錫琛，以字行，平陽宜山人。清末曾擔任浙江省諮議局議員，入民國後為浙江省參議會議員，平陽縣財政科科長。陳對晚清以來平陽地方教育建設與慈善活動投入相當多的心力，見平陽縣慈善總會編，《慈心善舉：平陽歷代善人善事回眸》(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5)，頁31-32。

<sup>52</sup> 張達甫，平陽縣城東門人。開設敘和醬園，曾任平陽商會會長，為黃光好友。關於張達甫與敘和醬園，見游壽澄，〈黃雲卿與黃泰昌的興衰〉，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平陽：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第6輯，頁38-40。

<sup>53</sup> 阮伯陶，平陽城關西門人，清金陵陸師學堂畢業。曾任清陸軍巡防統領、浙江第五區參謀官等職。辛亥革命後辭官回鄉經商，曾任縣濟嬰局總董、縣商會會長。見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379。

<sup>54</sup> 仙壇寺為平陽地區的唐代古剎，平陽佛教會設於此。關於此寺，可見劉紹寬，符璋主纂，《民國平陽縣志》，卷46，〈神教志二〉，版心頁3-4，頁482。

<sup>55</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381。



無富室巨商，宜合商民，集資較多。」<sup>56</sup>這也等於說，大多數地方菁英的意見都還是以保全地方為重，要如何募款，顯然欠缺共識，這可見於黃光與友人關於團練的對話：

越生來，謂辦民團不可省，宜遴選有拳棒技術者三十人，以資實用。余慮經費無著，越生曰：否，不然。只怕不肯辦，不怕無經費也。余笑曰：如君言，其勒捐乎？<sup>57</sup>

自清中葉以來，平陽地方菁英當地因應地方治安的變局，辦理團練的經驗已十分豐富，<sup>58</sup>但也因對局勢理解不同，漸次形成兩種不同意見。首先，透過紳富派捐來辦理團練維持地方治安，的確有引起過因攤款不公平所導致「勒捐」，反而深化原有派系壁壘，恐有如金錢會時期瑞安孫家失去人心的危險；<sup>59</sup>另一個意見則是積極地因應這股外來浙軍的過境所「可能」會引起的危險。為何會有這樣的看法，可見黃關於「機關槍」的記載：

八月十二(國曆9月10日)登仙壇寺訪黃連長，即留吃飯。看機關槍製造奇妙，詩以紀之：可是風雲起砲車，千圈彈綴似連珠。機關奇妙非夷思，不數先賢八陣圖。<sup>60</sup>

相對於劉紹寬等構想依靠「棍棒」的團練組織，風雅的詩作也掩蓋不了黃光對新型殺人機器威力的畏懼。因此，黃力主妥善安撫這批擁有現代武器的軍隊。隨著證實閩軍偵察隊已現身於平陽境內，劉為首的地方菁英方才同意自疏濬河道的地方公費中，雇人蒐集閩軍行進的情報。憂心忡忡的黃光還轉往浙軍探問：

<sup>56</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 382。

<sup>57</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 382，1924 年 9 月 12 日日記。

<sup>58</sup> 團練的辦理可說是地方治安自治的具體展現，擾動範圍達到平陽縣境的集體事件，如同治年間的金錢會、光緒年間的神拳會；或是，可能的外患來襲，例如甲午年(1894)年的中日之戰，平陽地區的士紳也有出面辦團的傳統。

<sup>59</sup> 關於地方政治中「勒捐」問題的討論，見羅士傑，〈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頁 182-184。

<sup>60</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 382，1924 年 9 月 12 日日記。

八月十六(國曆9月14日)謁徐挺然團長(名康聖)。徐公言論豐采，均尚脫俗。惟趾高氣揚，目空一切，有雄武之概，而無謙恭之容。所幸軍紀嚴肅，一相見即問：兵士在外，是否安分？且云：如有違法舉動，可即知我，絕不袒護。此次戰事，無甚價值，但願百姓不受苦就是了。<sup>61</sup>

浙軍徐團長自信滿滿的模樣，反讓黃光等人更為不安。隔日黃又以平陽商會勞軍的名義探問戰況：「閩軍有一千多人，聞尚有二千多餘未到。果是，吾軍只有取守勢也。」<sup>62</sup>到了9月18日，得知來勢洶洶的閩軍已經跨過閩浙兩省的省界。對黃光等人而言，閩浙兩軍看似呈現勢均力敵的對峙局面。隨著局勢的快速變化，決戰地點已從閩浙邊境轉移到了靠近平陽縣城的蕭江鎮，自是平陽百姓開始出現出城逃難潮。諷刺的是，一直到了9月20日下午，準備決戰的浙軍方才透過電報得知盧永祥兵敗下野的訊息，但在平陽的浙軍卻因沒有收到撤退命令，因此呈現僵持的局面。

9月21日，鄰近平陽縣城的蕭江鎮，浙軍隔著鰲江猛烈炮擊閩軍，以爭取戰場的主動權。但事後也得知，浙軍的炮擊所造成的戰損非常有限。此時，浙軍軍需官向平陽知事提出四千金軍用的要求，並限期當天下午三點繳齊。平陽知事邀集地方菁英，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面臨浙軍的強索，平陽地方菁英懷疑是知事的片面之詞，並探詢是否可與浙軍直接談判：

軍需官至，帶護兵四名，荷槍實彈，勢甚盛。一晤即言：頃得諜報，閩兵極多，步哨現已接觸。彼眾我寡，前方軍隊恐不能支，擬借此金犒賞，奮振軍心，以期一戰。否則，一經退卻，恐難制止。秩序之亂，我團長不負責也！<sup>63</sup>

浙軍此種態度，更讓在場相信浙軍敗相已露，但又不好當面拒絕。黃等人繼續與浙軍協商，也要求浙軍停止炮擊，以免糜爛地方。同時，劉紹寬的

<sup>61</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382，1924年9月16日日記。

<sup>62</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382-383，1924年9月17日日記。

<sup>63</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384-385，1924年9月21日日記。

門生蕭江鎮人周仲祥(1877-1944)，<sup>64</sup>則秘密前往接觸閩軍。9月23日，情勢急轉直下，閩軍在參事會議員湯執中(?-1924)的協助下，繞過浙軍主防線。防線遭到突破的浙軍，在沒有後援的狀況下，兵敗如山倒。如浙軍軍需官預言：缺乏紀律的撤退部隊與土匪無異，結果到處都聽聞四散潰逃浙軍持槍強奪財物，還出現結合青幫分子，想趁機滋事的傳言。<sup>65</sup>閩軍入城前，平陽知事躲進了天主堂，警察所長姚韶樓也不知去向，平陽縣城已是無政府狀態。對於手中無槍砲可恃，但又害怕地方因此糜爛的地方菁英所能運用的自保武器，也只剩下金錢與道德勸說：<sup>66</sup>

<sup>64</sup> 周仲祥，名宏毅，平陽慕賢西鄉(今蕭江鎮)人，少時師從劉紹寬。1904年畢業於杭州蠡學堂。1913年至1917年，受政府委託辦理平陽南港區的水利工程。1917年起至1927年，擔任溫屬聯立蠡校校長。見蕭耘春，〈周仲祥與南港水利〉，收入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蒼南：蒼南縣文史資料委員會，1986)第2輯，頁56-61。

<sup>65</sup> 生事力量就是「青幫」，青幫在平陽的活動以及與浙軍的關係都非常值得展開討論。根據黃光的記載，9月22日時，浙軍軍官到縣署要求釋放一名為董康的當地青幫幹部：「下午過公署，聞今早有二人到縣公署，自稱浙軍補充連連長高建勳，要求釋放董康，**以康有青字嫌疑**，奉郝司令命令，拿或在押也。知事給以請示團本部，而陰飭警士密拿同黨。」於是黨首陳一飛與其友某均被獲。到了9月23日浙軍潰敗之時，仍有浙軍軍官前來強逼知事釋放青幫人士的紀錄：「余入署，忽見一人帶護兵四名，荷槍入穿堂，逼放**陳一飛**三人。秩序已亂，法警多被毆。知事無法解紛，只得下條開釋。**聞三人出獄，即同到同源棧，出大洋一百多，分給同黨，購買鞭炮並洋油空箱，圖起事。入夜風鶴頻驚。**」關於青幫的研究，可見Brain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關於拖洋油箱與廿世紀溫州地方政治的討論，可見馮筱才，〈拖洋油箱：近代溫州鬧米風潮的儀式與政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上海，2016.07)，頁101-113。

<sup>66</sup> 20世紀中國各地軍事強人的部隊性質上更接近私人軍隊，當兵如一個穩定的職業，而非抓伏的結果。陳志讓引用社會學家陶孟和(1887-1960)，針對1920年代，駐紮在山西太原警衛隊的一千名士兵之背景進行研究。這些士兵中，87.3%來自農業或沒有職業的家庭，其餘是小手藝人、商人、醫士與教書先生。從事農業者，家裡所擁有的土地在27.4畝之下，71.1%的人無法靠農業養家。這些士兵中只有21%無父無母，49%雙親俱存，21.3%的士兵竟然是獨子。他們絕大多數不識字，年紀多在15-29歲之間(占全體88.5%)。據稱，年輕的士兵身體好，也容易聽長官的話，比老兵好帶。但他們也容易在打仗時逃跑，丟棄或出賣他們的槍械。至於1914-1919年廣東士兵的收入，平均一個月12元，可以剩9元養家；1917年因為部隊人數增加，每個士兵的收入減到6-7.5元之間。蔣介石的北伐軍，在1926年北伐前，士兵的平均月薪則為10-11元之

歸未炊許，署中又以片來邀，謂潰兵須招呼，否則必發生劫掠。余即囑注弟同村警陳熾昌帶大洋、鈔票即角仔數百，一路出去，買燭雇船，給路費。注弟請其報名領洋，竟被凶毆。惡哉！語言不通歟？亦性使然也？路經坦頭角樟樹下湖邊，分給小洋。瞥見暗地一人，酷似(浙軍營長)呂子瑜。余擬請其力任彈壓，整軍退卻。不圖一閃，避入船中，以致迷離撲朔，不敢請教也。<sup>67</sup>

上文可見浙軍潰逃的亂象，自告奮勇的黃光等人出面出資安撫浙軍潰兵，但已是杯水車薪。諷刺的是：這些潰逃的浙軍「職業軍人」竟比黃光等人還要擔心在戰場上失去生命。對地方社會而言，軍隊潰逃時的燒殺擄掠，方是最大的威脅。就算是地方參事會議員的黃光也無法保障他自身的安全：

忽潰兵搶檣燈，群地民飛避。余適在後，即被推倒。一人足及余肘，痛不可當。眼鏡打破，幸未刺傷面部，危險！危險！<sup>68</sup>

黃的應對可謂勇敢但粗率，竟還以為可運用勞軍的方式去處理潰兵的問題。驚魂未定的他，基於自己對地方的責任感，又開始與其他地方菁英商討如何接待即將入城的閩軍的問題。閩軍開入平陽縣城後，派來永嘉籍的陳卓先聯繫接待事宜，當天一日數變：

(陳)卓先來稱：後方鍋鏊未到，須先派民間送飯並碗筷。至菜蔬一節，只用腐乳、鹹菜足矣，臥亦只須稻草、篾簾，唯長官宜借數十床被也。余即偕同人四處招呼，幸各戶陸續送來。簞食迎師，不圖今日見之。至(晚間)八點鐘尚有六百余人未吃，因飢成怒，各荷槍疾馳，言欲入署與辦事人為難。余疾與銳生商議，屬法警等速將存米先行發煮，以安軍心。知事亦以為然。俄而副官來，謂原備翅席十一桌不夠，須每營十一桌。知事目瞪口呆，不能答。不但時間迫猝，即魚翅亦買不到也。遂急請卓先來，表面疏通，暗中再關門徑，始就平復。總是地方與孔方面子也。<sup>69</sup>

間，但因為多半是新兵，收入的差異不大。綜合比較，一個士兵如果月入 8 元，等於耕種一百畝地的一個四川自耕農一家五口的收入。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頁 72-73。

<sup>67</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 388，1924 年 9 月 23 日日記。

<sup>68</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 388，1924 年 9 月 23 日日記。

<sup>69</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 391-392，1924 年 9 月 24 日日記。

這除了反映出閩軍的補給狀況不佳與閩軍戰勝者的傲慢，從黃光所感嘆的：「總是地方與孔方面子」，我們其實也看到了平陽縣地方資源的窘迫，以及黃光本人那種獨木難撐大局的失落感。

浙軍盧永祥 9 月 16 日在宣布下野，溫州戰場原本應可和平解決，何以浙軍駐在溫州的郝國璽卻不對平陽前線下達撤退令？這一方面可能是溫州城內地方菁英希望浙軍可以續留溫州維持治安，另一方面，浙軍郝國璽所持的理由則是因為害怕因發布撤退命令，浙軍會被閩軍徹底擊潰，才會發生浙軍不退，繼續炮擊閩軍的事情。但身處在溫州府城的郝沒有料到的是：閩軍竟然可以取得平陽地方菁英湯執中的協助，在裡應外合的狀況下，短時間擊潰浙軍防線。湯對閩軍提供的協助，如黃光所示：

湯君容夫(執中)隨第三隊行。見余，即握手立談，言：近日為閩軍畫策，繪一軍事地圖，作張松之獻。閩軍獲勝，我之力也。我意本不出此，緣有人向浙軍徐團長告密，謂我有私通閩軍嫌疑，欲密捕我。幸先得信，急行出城，始免於難。吾輩仇怨，於筆墨上攻擊，原無不可，豈忍如此壞心，必欲置之死地。我實含冤，故一意襄助閩軍。況彭司令藹然可親。見我大加賞識，相見恨晚，非如徐之目中無人。<sup>70</sup>

湯執中此人，據劉紹寬的回憶，大約出生於 1890 年代初，曾擔任縣參事會副議長一職，他可說是經歷過晚清新政「紳轉吏」之年輕一輩的地方菁英。從黃光筆下，可見縣級地方菁英是如何運用閩浙兩軍對峙，去進行地方政治競爭。閩軍在湯等人的引導下順利北上，但湯也疑似因過度積極且野心外露，反而引來閩軍對他的通敵疑慮，導致引來殺身之禍，後續如他的老師張綱在日記有云：

民國十三年十月六日(農曆九月初八)昨在瑞聞陳亦默說，平陽湯生執中，數日前在郡賓樂旅館與潘鑒宗之弟介賓，同被彭司令遣兵傳去，已於昨早將湯生綁赴資福山上槍斃，介賓由呂文老、沈劍豪力保，現交司法處訊問矣。聞湯生和平陽與閩兵交通，代排戰陣，以致郝兵潰敗損失生命數百，近又向彭司

<sup>70</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 391，1924 年 9 月 24 日日記。

令要求參謀，彭不之允，又欲轉機通郝，事經彭覺，故捕去坐以招搖撞騙之罪，遂得此禍。噫！湯生為予十餘年前中校老門生，其人才頗不羈，但好談革命，冒險僥倖，民國初年幾以革命被戮，幸證據為其妻藏匿，得以漏網，今竟以通敵獲禍，亦可謂咎由自取矣。<sup>71</sup>

姑且不論張綱在筆下對後生批評口氣，我們也完全可感知到湯執中此人可說是 20 世紀以來，平陽地方政壇的新一代野心人物，與劉紹寬、黃光等強調秩序穩定不同，他醉心於革命，並相信透過自身付出的努力是足以改變政治局勢，也因此對引起重大改變的政治活動躍躍欲試。透過劉紹寬描述，我們也可得知湯執中更多的背景：

湯生執中，為人才氣，有口辯，兼善屬文，惟行不軌於正，賭博、姦淫、唆訟，拆白無所不為，年僅三十餘，為縣議會副議長，適孫傳芳軍自閩入浙，旅長彭德銓過平陽首先迎之，大言招搖，謂為參謀，有被其愚者函致彭帥，乞其為提拔。函為彭旅長所得，甚疑之，查其人非正類；而湯猶不知，出入彭帥間。有承彭意旨者誘之入幕，遂以收禁。時彭帥駐永嘉，訪問溫人，無一為營救者，遂罹槍決之厄。<sup>72</sup>

相對於張綱與劉紹寬兩人生活在帝國體制下，屬於講求自我節制的世代，年輕一輩的湯執中「不羈」的政治性格，可說是他們三人最大的不同。從 20 世紀以來地方政治變遷的角度考察，我們也可以發現：湯執中這樣的年輕世代，雖已取得地方政治領域中的職位，但顯然並沒有獲得足以左右當時軍閥相爭與地方政治結構的資源，導致他個人的悲劇下場。儘管黃光與湯執中兩人，分別在不同的面向，對閩浙兩軍在溫州的戰事做出了個人能力所及的努力。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兩人的努力並沒有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若是如此，這一場兵災將如何落幕，又是哪些力量讓這場兵災順利落幕？除了前述的天主教會外，還有哪些關鍵的力量發揮作用？如同前文，

<sup>71</sup> 張綱，張鈞孫、戴若蘭整理，《張綱日記》，民國 14 年 10 月 6 日。

<sup>72</sup> 見劉紹寬，《果報征信錄》，收入陳瑞贊編，《東甌逸事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頁 642-643。

黃光所感慨的「總是地方與孔方面子」，下文即要透過晚清溫州地方政局中，少為人所討論的銀行家呂文起在此一事件中所揮發的作用。

#### 四、結合地方與孔方：呂文起與 20 世紀初期的溫州地方政治

呂渭英(1855-1927)，字永年，號文起(以下稱呂文起)。清咸豐五年(1855 年)生，其父呂振鏞為一下層軍官，世居溫州府城內的通道橋(今晏公巷)。呂 15 歲即中秀才，光緒十一年(1885)中舉人，二度挑戰進士不售，之後選擇留在北京與溫州在京大老黃體芳(1832-1899)學習。<sup>73</sup>1894 年，呂以舉人的身分透過大挑，以候補知縣的身分外放福建任職，先後擔任惠安、閩縣、浦城等沿海區的知縣，熟稔福建地方洋務。他於 1902 年以熟悉民情與辦理對外交涉有功，升為福州知府，1903 年累官至道臺。<sup>74</sup>透過 1906 年呂督修《閩縣鄉土志》一書，可見呂對 19 世紀末以來福建地方新興事務的掌握與看法。<sup>75</sup>經年擔任福建地方官，呂也順著晚清以來「新政」對商工實業的重視，開啟他職業生涯的另一頁。1903 年 9 月 7 日，清帝國新設商部。1904 年 8 月，商部開始推動在全國各省「商務議員」制度。該議員主要的任務在報告「提倡保護之法與夫貿易盛衰之故、貨物出入盈虛消息」之調查研究工作。<sup>76</sup>1905

<sup>73</sup> 黃體芳(1832-1899)，溫州瑞安人，咸豐元年(1851)舉人，同治二年(1863)進士，與晚清名臣張之洞為同年，光緒九年(1883)起歷任福建、山東、江蘇等省學政，累官至內閣大學士、兵部左侍郎，為晚清北京政壇清流派中堅份子。見黃體芳，俞天舒編，《黃體芳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 1-9。又可見余振棠，《瑞安歷史人物傳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 133-135。

<sup>74</sup> 關於清帝國吏部對呂渭英在福建地區任免的討論，可見許應駟奏，〈奏為福建辦理水災賑捐出力之福防同知呂渭英試用縣丞陳文溥前各因功奏保在案特請分別改獎呂員請以道員用陳員請以直隸州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故機 156107 號，頁 1。至於呂調任福防同知的決定，見李興銳奏，〈奏為洋務重要請准將福防同知呂渭英暫緩送部引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故機 160208 號，頁 1。

<sup>75</sup> 朱景星、李駿斌，《閩縣鄉土志(全二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sup>76</sup> 載振等奏，〈奏為擬請將各省商務等局總辦差使酌由臣部劉充商務議員以資聯絡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故機 162648 號，頁 3。

年商部所正式頒布的各省商議議員章程，則明定各省督撫於候補道府中選任熟悉商務人士。呂文起符合任用的資格，他於 1907 年所撰寫的調查報告，明白指出金銀機關(包括錢莊及外商與本國銀行)對福建經濟發展的關鍵影響力，這也替他日後參與創立浙江地方銀行埋下伏筆。<sup>77</sup>

1909 年呂辭官返溫，擔任溫州府商會最後一任總理。呂告別官場，是因為看到發展實業所能帶來的機遇。<sup>78</sup>1910 年起，他在溫州地區開辦輪船航運，並倡議開辦銀行、電話、電燈等業務，雖開風氣之先，但未能獲得多數溫州地方菁英的支持。之後，應末代兩廣總督張鳴岐(1875-1945)的邀請，呂於 1910 年轉往廣東官銀錢局(廣東省銀行前身)擔任總理，不多久即遇到辛亥革命，但「粵省各局所文卷皆散漫無紀，獨銀錢局簿據齊備，粵中報章因此稱道公之處利藪而不取，不以苟得玷其操守」。<sup>79</sup>溫州易幟後，他應陳介石(1859-1917)<sup>80</sup>之邀，短暫擔任溫州軍政分府交涉部和財政部長，隨後因為陳乏人支持而離職。之後，由浙江省官錢局改組的中華民國浙江銀行總理朱葆三(1848-1926)邀請呂至該行擔任協理之職。1913 年起，該行因為官股與商股之間的爭議，日後而有分家為浙江地方銀行與浙江實業銀行的討論。<sup>81</sup>1915 年，中華民國浙江銀行股東會決議改組為實業銀行，呂等七人出

<sup>77</sup> 呂渭英，〈調查報告：福建金銀機關近年消長情形，福建商務議員呂渭英申報〉，《政治官報》，第 68 期(北京，1907)，頁 18-19。

<sup>78</sup> 清末以來溫州商會的發展，見郝建興、黃紅華、方立明等，《在政府與企業之間：以溫州商會為研究對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 52-57。

<sup>79</sup> 任宏中，〈呂公紀念碑記〉，收入潘猛補編，《呂渭英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1)，頁 207-208。

<sup>80</sup> 關於陳介石在晚清溫州地方政治的角色，見李世眾，《晚清士紳與地方政治：以溫州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特別是本書第五章的討論。

<sup>81</sup> 此間官股與商股的分家過程，可見何品，〈權與錢的較量：1923 年浙江地方實業銀行官商分股事件評析〉，收入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編，《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變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90-208。



任商股董事。<sup>82</sup>原是前清官員的呂文起，搖身一變成為銀行高級管理階層，所能發揮的實力，可見下文：

1913年，陳其美在滬起義討袁，向浙江銀行籌款四萬，作為起事之費，協理呂文起，慨然撥付，此款由浙地行所得紅利彌補。<sup>83</sup>

辛亥革命後，浙江地方銀行應浙江省軍政府的要求，代為發行兩期軍用票和金庫兌換卷。第一期軍用票發行於 1911 年 12 月，總額 300 萬元，其中 100 萬救濟商業，200 萬充作軍餉。期限六個月，事後如期如數兌換。第二期軍用票是 1912 年春發行，1917 年基本回收完畢。<sup>84</sup>持平而言，呂文起給付給陳其美(1878-1916)的軍費，應該還是在銀行經營的風險管控範圍內。進入 20 世紀後，清帝國推動的新政以及之後民國對金融事業的投入，本國籍銀行業因此快速發展，專業經理人在銀行業的經營的角色越來越重要。<sup>85</sup>呂文起正處在此世代轉型的時刻，他是傳統儒家教育的菁英，隨著時局的變遷，他快速接受時代的變遷，學習新理財概念與技能。雖說仍有其侷限，也算是完成近代銀行業發展的階段性任務。簡要地介紹了呂文起如何熟悉新的孔方之道，下文將討論他如何以此結合地方。

1916 年，滿六十歲的呂文起決定告老還鄉，也進入他生涯最後一個階段。呂與清帝國時代的許多退休官員類似，對興辦地方公益與慈善活動很有興趣，也因此在地地方上享有盛名。<sup>86</sup>呂也是 20 世紀溫州最早的一批實業

<sup>82</sup> 見何品輯錄，〈浙江實業銀行及其前身大事記，1908-1937〉，收入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編，《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 429-431。

<sup>83</sup> 〈本行簡史(上)〉，《浙光》，第 1 卷第 1 號(紹興，1934.10)，轉引自張朝暉等，《近代浙江地方銀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30-31、267-268。

<sup>84</sup> 張朝暉等，《近代浙江地方銀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93。

<sup>85</sup> 關於晚清至民國銀行業的運作情形的討論，近年學者在過去之江浙財閥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大量上海及浙江地方檔案館的資料所進行的討論，非常值得參考。見 Linsun Cheng, *Banking in Modern China: 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 1897-193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86</sup> 目前田野可見的碑刻資料，與呂文起相關的地方公益事件如下：他捐資重修溫州地區的古剎江心寺、重修溫屬圖書館、建立甌海醫院、創辦協濟善堂、重修華蓋山公園、建立永嘉東安詞人祠堂，可見胡調元，〈華山老和尚重修江心寺記〉；王毓英，〈溫

家，何以至此？主要還是因為他與年輕一代地方菁英楊雨農(1880-1951)間的合作。楊的父親在溫州城內開設南北貨行，楊雨農繼承父業，卻未能忘情於科舉。雖因個人能力與時代因素的影響下，未能如意，也由於這一經歷，與呂等人的溫州科舉菁英有了共通語言，從而掌握地方政治的進身階。除了來自父親的庇蔭外，他還獲得承包地方糖捐的利權，1921年起，楊兩度被選為浙江省議會議員，又出任永嘉縣商會會長。當時人對他有「多財善賈，長袖善舞」的評語。<sup>87</sup>在開辦地方實業方面，1919年楊雨農創辦溫州第一家電話公司：東甌電話公司。據股東回憶，公司成立時出定資金為一萬銀元，分為一百股，由發起人優先認股，並同時對外募股。呂文起亦出任公司的首屆董事。從公司創辦起至1928年為平穩發展期，公司定期召開股東會亦固定發給股息。<sup>88</sup>溫州電力事業方面，1924年楊接辦1913年成立，但經營不善的溫州普華電燈公司，楊出任總經理，呂文起擔任董事長。<sup>89</sup>兩人除了引進可以改變日常生活的科技外，呂文起與楊雨農亦致力於興辦教育與醫療事業。20世紀溫州城內只有英國基督教會的白累德醫院與法國天

屬圖書館碑記》；黃慶瀾，〈甌海醫院碑記〉；呂渭英，〈協濟善堂碑記〉，收入金柏東編，《溫州文獻叢書：溫州歷代碑刻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411-412, 417-418, 422-424, 428-429, 430-432, 433-435。見潘猛補，〈呂渭英傳略〉，收入潘猛補編，《呂渭英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1），頁1-4。

<sup>87</sup> 陸雨之，〈我所知道的楊雨農〉，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7）第3輯，頁168-169。又可見楊瑞津，〈緬懷祖父楊雨農〉，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文史資料委員會，1998）第12輯，頁339-344。又可見陶水木編，《近代浙商名人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102。

<sup>88</sup> 黃伯蘊口述，孫孟桓紀錄，〈東甌電話公司創辦始末〉，收入張憲文編，《溫州文史資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4輯，頁254-259。

<sup>89</sup> 楊對電力公司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43年前後。溫州城區有電力供應始於1912年，寧波藥商王香谷等人在永嘉縣城外，籌辦協利電燈公司，後由李湄川等人接辦，並改名為溫州普華電燈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春，引進美製發電機組於1914年發電。1922以來，城區用電需求增長。1923年因為城區用電力增加，但因為缺乏股東資金挹注，因此出現資金缺口。楊雨農等人出面協調溫州城內錢莊挹注，1924年，因為公司又進行改組，易名為溫州普華興記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增至15萬元，同年發電時間由每天八小時延長為十二小時。見浙江省電力工業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電力工業志》（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5），頁81-83。

主教會的董若望醫院，為此楊與呂等人於 1919 年協助創辦甌海醫院以及甌海中學。<sup>90</sup>值得討論的是，溫州幾次因抵制日貨所發動的學潮，楊雨農的南北貨店也遭到學生攻擊，由此也可看出，呂、楊二人涉足事業面向之廣。<sup>91</sup>持平而論，此跨世代的地方菁英聯盟的合作所興辦的諸多事業，重塑了 20 世紀以來溫州的城市生活樣貌。

回到 1924 年 9 月 23 日的溫州城內，聽聞平陽前線浙軍潰散，閩軍將往府城開拔的消息後，透過符璋(1853-1929)的描述，<sup>92</sup>當日呂文起(1855-1927)即與浙軍將領郝國璽有以下的討論內容：<sup>93</sup>

清晨詣呂文老，談及昨夜九鐘偕徐知事、楊(雨農)議員苦留郝司令暫勿去溫事，至於常跪不起，如不見許，請渠先行槍斃再行，始允暫留等情。<sup>94</sup>

除永嘉縣知事與近古稀之年的呂文起外，楊雨農在會談中的角色與黃光近似。閩軍入境平陽，之後北上溫州府城，對地方社會而言，就是一場兵災

<sup>90</sup> 馮堅，〈楊雨農與溫州慈善事業〉，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7)第 19 輯，頁 255-259。

<sup>91</sup> 1919 年 4 月 26 日，溫州青年學生前往搗毀專賣日貨的東洋堂。7 月 30 日，城內又因米荒引發騷動。當時因為學生自楊經營的南北貨店，抄得日本製海帶 40 包，學生以愛國之名拘捕楊雨農，並要求他當眾簽下悔過書。陳世奇，〈五四運動在溫州〉，收入張憲文編，《溫州文史資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 4 輯，頁 138-142。

<sup>92</sup> 符璋，字聘之，一字笑拈。原籍江西宜黃，生於福建福清縣。12 歲喪父，後遷居浙江。同治十一年(1872)開始擔任軍隊之幕友，也曾擔任浙江處州松陽知縣，後因故被罷官後，遷居溫州。宣統元年(1909)擔任溫處道文案及統計科科長。宣統三年署瑞安縣知縣，辛亥革命後留任瑞安民事長。民國五年，赴平陽擔任縣志總纂。1922 年開始賣文維生，兼任甌海道參議、甌海關顧問，並領過招商局津貼。1924 年短暫應聘為浙軍郝國璽秘書。符的一生多擔任軍隊文職稿識及幕友職位。見陳光照，〈前言〉，收入符璋，陳光照點校，《溫州圖書館編：符璋日記(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 4-5。

<sup>93</sup> 見潘猛補，〈呂渭英傳略〉，收入潘猛補編，《呂渭英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1)，頁 1-4。

<sup>94</sup> 符璋，陳光照點校，《溫州圖書館編：符璋日記(全三冊)》，頁 914。

人禍。楊當時的想法是想憑藉浙軍成犄角之勢。但局勢變化快速，善後處理如張綱 9 月 26 日從張醒同處聽聞<sup>95</sup>：

赴浣沱(張醒同家)，聞孫公直說：瑞城現有呂文起及法國教士出為議和，郝國璽定要瑞城給他**三萬元兵餉方肯撤兵**，現已議妥，楊君述知事允為挪借發付，郝兵遂陸續撤防回郡。瑞安城即寫貼白旗投順閩軍，另派赴平邑迎之入瑞。如果閩軍過境秋毫無犯，則吾(河)鄉一帶可以帖然安枕矣。<sup>96</sup>

對比其它資料，張綱的聽聞大致無誤，所提到的法國教士即為溫州教區主教馮烈鴻神父。馮神父之所以會被引入這一場地方政治的善後，與溫州府城紳士與官員的邀請(或說對其地方實力的認可)有直接的關係。先是，府城內的紳商聽聞閩軍已經逐漸進逼溫州，擔憂戰禍肆虐，各方遂邀請呂文起出面協調浙軍撤退，以及閩軍過境事宜。原本答應陪同呂到平陽與閩軍談判的地方菁英臨時龜縮不前，最後只有呂文起與林立夫<sup>97</sup>兩人仍願意前往，年老的呂文起擔心「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邀請府城中的地方政治實力者一同參與閩軍協商。幾經思量，呂以及溫州城內官員最後決定邀請馮烈鴻神父。<sup>98</sup>馮會被邀請，自然與天主教會背後的法國政府有關。當浙軍前線敗陣後，溫州城內出現逃亡潮，情勢一度十分不穩。如符璋 9 月 23 日所記：

<sup>95</sup> 張醒同，曾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長期擔任鄉長。

<sup>96</sup> 張綱，張鈞孫、戴若蘭整理，《張綱日記》，民國 14 年 9 月 26 日。

<sup>97</sup> 林立夫(?-1935)，收入溫州市甌海區茶山鎮人，曾經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法，民國年間曾擔任議員和財政部、鹽務署顧問，辦過報紙，辭官後回鄉開辦私塾。子林訓明(1921-?)後為巴西重要企業家。

<sup>98</sup> 為何會邀請馮神父同往，有兩種說法：根據鄭頡鋒的說法：當時溫州著名木匠天主教徒陳明桃，拜訪呂文起，表示可請天主堂馮烈鴻神父同往。9 月 22 日上午，溫州道尹邀請馮烈鴻到道府商議，請他陪同呂文起前往平陽調停。另外，根據朱維方的記載：呂文起請求馮公協助，馮公欣然承諾，和輔祭曾月舫先生等人與閩軍接觸。鄭頡鋒，〈溫州天主教會三大善事〉，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第 3 輯，頁 124。關於溫州天主教的發展歷史，可見朱維方神父，《溫州天主教簡史》，頁 19。

城內遷徙者紛紛，土匪與青、紅幫皆躍躍欲動。……是日，詣天主堂，晤馮神父，商借房屋為暫避計，遂看定女醫院第二等第三間屋一間。蓋昨日有函與馮相商，未得復，不能不面商也。<sup>99</sup>

溫州府城內的居民聞知天主教會願意提供實質庇護後，隔日 9 月 24 日，無法逃離府城的居民紛紛湧向有法國士兵保護的溫州天主教會醫院：

是日入院男女老幼如蟻，幾無隙地，稍遲者則房為他人占居矣。**夜有法兵巡守甚周，架機關砲於大門，事勢之危可見。**(9月25日)……，聞呂、林二紳偕馮神父赴平陽接洽，遷入者益多。(甌海)道尹入簡巷醫院。<sup>100</sup>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平陽。這也等於說，溫州與平陽的官民一齊「用腳投票」，把馮神父推往平陽閩軍處。透過法國軍隊的保護，溫州天主教會可以提供保護給遭受戰禍威脅的溫州百姓。呂文起與馮烈鴻一行 9 月 25 日自溫州府城出發，先在瑞安待一晚，隔日跨過飛雲江進入平陽縣境，早上十點左右抵達平陽縣府，面會閩軍司令彭德銓，當日狀況如黃光所記：

早起即赴署。俄而呂文老、馮神父、林立夫、瑞安楊知事君述，胡蓉村、陳亦典諸公到署。談炊許，吃過點心，即同去謁彭司令，致歡迎意。回署午飯後，匆匆分返瑞、永，先鋒隊即隨之去，大軍明日八點準開。先鋒隊開時，各軍官將馮神父、呂文老等轎一齊扣住。眾皆徬徨不感言。幸呂公跟人手足靈敏，急向馬弁說好話，稍用幻術，竟將馮、呂兩轎抬回，安然坐去。而楊知事一班無法可設，只好說一句：不必客氣，我等還是走走暢快些。遂聯二接三，安步當車，迤邐出東門，到八角橋買舟而去。余返舍，彭司令適來辭行。<sup>101</sup>

在黃光的眼中，這一場短暫的會談顯然是機鋒處處，不到最後一刻，還無法塵埃落定。這場會談何以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呂、馮兩人到底向閩軍傳

<sup>99</sup> 符璋，陳光熙點校，《溫州圖書館編：符璋日記(全三冊)》，頁 914-915。

<sup>100</sup> 簡巷醫院為英國基督教會在溫州城內所建立的醫院。符璋，陳光熙點校，《溫州圖書館編：符璋日記(全三冊)》，頁 915。

<sup>101</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 394，1924 年 9 月 26 日日記。

達了哪些重要訊息，旁觀者的黃光並沒有多加記載。長期擔任幕僚工作的符璋，則於 9 月 30 日的日記裡，清楚地交代協議內容：

郝司令廿七夜登舟由樂清去，廿八開行，由呂籌洋兩萬元贈之。此次閩軍入城，供張費由四明銀行借乙萬元，分九處辦理。入城時市上懸白旗，書「歡迎勝軍」四字。<sup>102</sup>

呂先前在浙江地方銀行供職，他先與浙軍郝國璽討價還價後，把郝要求供浙軍退出溫州的四萬降成兩萬。同時，呂再承諾從四明銀行借出款項給郝。四明銀行於 1908 年成立，為當時東南沿海地區最重要的商業銀行之一，關鍵是該行還擁有地區的通貨發行權，該行所發行的鈔票可以在上海、漢口、寧波、溫州、舟山等沿海與沿江地區通行。<sup>103</sup>因此，閩軍也願意接受呂提出的條件，秋毫無犯地過境溫州。另一個讓談判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顯然是馮神父的同行。雖說馮未申請法軍隨行保護，但因對法國勢力忌憚，不管是浙軍或閩軍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面對這些貪婪的軍人，馮也不敢掉以輕心：

彭德銓派員護送代表到飛雲江南岸，……。在回來的路上，馮烈鴻對隨員曾月舫說：這次我們去，死活難卜，我一直捏一把冷汗。幸好，我是獨身人，你還無家室，即使有個三長兩短，也無後顧之憂，現在總算安全地回來了。<sup>104</sup>

條件都已談妥，兩軍也都獲得要求的「贖金」，便按照既定的計畫：浙軍往台州方向撤退，閩軍則往溫州城的方向前進。諷刺的是：明明並不受歡迎，

<sup>102</sup> 符璋，陳光熙點校，《溫州圖書館編：符璋日記(全三冊)》，頁 916。

<sup>103</sup> 沈允德、陸雨之，〈解放前的溫州金融業〉；佳聲，〈溫州與寧波的歷史關係〉，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鹿城文史資料》(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7)第 2 輯，頁 20-30、43-52。關於近代浙江金融業的發展，可見陳國強主編，《浙江金融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四明銀行寧波幫的關係，見金普森主編，《虞洽卿研究》(寧波：寧波出版社，1997)；金普森、孫善根主編，《寧波幫大辭典》(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sup>104</sup> 鄭頓鋒，〈溫州天主教會三大善事〉，頁 125。

閩軍卻要求行軍沿線經過的商家，插上「歡迎大軍」等字樣的白旗。<sup>105</sup>但就算是有序的行軍，閩軍仍對地方的治安造成重大威脅，而且無人敢管：

聞近日瑞城閩兵毫無紀律。有城隍廟街道士吉之媳，饒有幾分姿色，時兵寓城隍廟者見而涎之，託借掃帚為名即闖入吉家，有四五人強扭其媳，於灶柴倉內按之行淫，經其媳大喊叫天，始行釋放，……。道士吉雖赴知事署喊冤，仍置不理。……於是小家碧玉無不聞風膽寒，紛紛閉門不出。<sup>106</sup>

除了個別閩軍士兵的脫序行為外，就制度性的安排而言，閩軍經過人煙密集的城區，還普遍發生強拉路人挑擔或搶劫的狀況。受害者雖然都有向當地政府告發，卻沒有單位願意出面，最後只能自認倒楣。<sup>107</sup>不管是面對浙軍或閩軍所引起的兵災，溫州當地的政府與地方社會都呈現只能被動應付變局的狀況。在此情形下，不同世代與背景的溫州地方菁英與天主教會結成聯盟，成為此次溫州地方最重要的安定與保護力量。

## 五、結語：「保障一方」與「一視同仁」的兩塊匾之外

1924年浙閩之戰結束後，閩軍一路開往浙北宜興，為孫傳芳建立短暫控制東南五省的局面提供後盾。黃光也因幫助地方安定，獲得平陽地方士紳聯名贈送一匾：

承地方商民公送一匾，曰：「保障一方」。跋云：甲子秋仲，閩贛聯軍入境。浙軍駐防前方者，晝夜潰退，城鄉居民逃避一空，地方危如累卵。幸仗梅僧黃先生既張君達甫，出而招待潰卒，供應客兵。……。爰公議贈送匾額一方，以作在莒之紀念云爾。余不敢受，再四辭謝，商家群來，強為懸掛，慚愧之至。<sup>108</sup>

<sup>105</sup> 張桐，張鈞孫、戴若蘭整理，《張桐日記》，民國14年9月27日。

<sup>106</sup> 張桐，張鈞孫、戴若蘭整理，《張桐日記》，民國14年9月30日。

<sup>107</sup> 張桐，張鈞孫、戴若蘭整理，《張桐日記》，民國14年10月3日。

<sup>108</sup>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頁401-402。

這樣的贈匾行為經常見於地方政治的場域中，呈現出的效果往往是地方社會群體對某些個人貢獻的認可。透過本文的分析，黃光在文中所表達出的慚愧，顯然並不是謙讓之語，而是深刻地認識到黃自己力量的有限與無法改變局勢的現實。畢竟若不是呂文起等人出面籌集款項給浙軍與閩軍，並結合天主教會在地方所發揮的政治實力，無此「孔方」與「地方」的結合所提供的保護，溫州實在無法平安地度過這一場兵災。

除此「保障一方」的匾額外，透過本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天主教會在 20 世紀上半溫州地方政治發揮的影響力，包含馮烈鴻親身前往線調停，以及天主教會提供居民庇護，此善舉得到許多人的敬重。如符璋在日記中所言：

9月29日，……。詣馮神父面談並謝，渠亦道謝，謙挹有加。云此次天主堂內住二千餘人，合男女院共有共有四千人之譜，不厭繁瑣，亦不爭謝禮多少，洵難得矣。<sup>109</sup>

馮之所可以提供庇護，與法國駐中國的士兵參與教堂與教會物產的保護工作，有直接的因果關係。雖說法國士兵的人數遠不及閩軍與浙軍，但此間結合國際政治現實在地方政治中能發揮的力量，卻顯然是當時地方社會中可見可恃的穩定力量。關於天主教會在地方政治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的變化，對比 1909 年瑞安地方菁英項崧(1859-1909)，對自 1884 年以來基督宗教與溫州地方社會關係有描述如下：

當是時，民之於教，然切齒甚矣。然終攝於官，隱而不敢發。教士因是越得自恣，而教民從而助其虐，官一切不問，委屈隱默，深恐因此而激成事變者。<sup>110</sup>

透過本文的分析，隨著天主教會內部領導權更迭以及傳教策略的變化，也不過十多年的時間，天主教會與地方的關係已有顯著的變化。由於天主教會願意出面保全，使地方免於遭受兵災之苦，在閩浙戰爭後，呂文起等溫

<sup>109</sup> 符璋，陳光熙點校，《溫州圖書館編：符璋日記(全三冊)》，頁 915-916。

<sup>110</sup> 項崧，〈記甲申八月十六日事〉(乙酉，宣統元年，1909 年 4 月作)，收入張憲文輯錄，〈甲申教案及拳民運動的幾則史料〉，頁 228。



州士紳聯名致贈溫州天主教會匾額，書「一視同仁」四字。<sup>111</sup>可見在溫州地方菁英心目中，天主教會形象已有非常具體的改變，逐漸擺脫過往「偏袒教民」的負面形象。更重要的還是天主教會在此時所展現出的人道主義關懷與對弱勢群體的重視。

透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生活在溫州不同世代的傳統科舉精英如劉紹寬、黃光、呂文起、楊雨農起等人，雖說無法成為具有全國性知名度的高官。但也因為他們因時利導，去調整自己的心態，並積極地推動了自身與帶動周邊的日常生活層面的改變。例如：黃光投入現代教育的地方制度的推動，呂文起投入現代金融業的發展，都有其代表性的意義。隨著時代的改變，不在科舉試場中得意的地方菁英，反而以新身分，發展出新思維，繼而能在步入 20 世紀的地方社會中發揮影響力。他們都經歷了由紳轉商、由官轉商的轉型，除了運用商人與實業家的身分參與 20 世紀以來多元地方政治格局的建立外，同時也參與 20 世紀以來現代城市生活秩序的運作。

進入廿世紀以後的中國，不同人群糾結於改革的層面與程度的問題，<sup>112</sup>辛亥革命的猝然發生，則使各地必須發展出與強調速效的「革命論述」共舞的方式。<sup>113</sup>但透過更細緻的地方歷史重建，我們可以發現地方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不同人群，是可對比於美國史家彼得·蓋伊(Peter Gay, 1923-2015)對同一時代歐洲資產階級的觀察：

焦慮會催生防衛，也就是催生出一些用來駕馭或否認焦慮的策略。……不過十九世紀的防禦策略失敗的時候並不比成功的時候少，而失敗又會倒過來引起新的焦慮。面對不斷創新一定會帶來的茫然感，甚至混亂感，一個很自然的反應就是再次尋求秩序的保護。<sup>114</sup>

<sup>111</sup> 根據田野的實地考察，該匾已毀於文革。

<sup>112</sup> 關於清末推動的宗教與教育改革對地方社會產生的影響的討論，可見 Vincent Goossaert, "189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 no.2(2006):307-335.

<sup>113</sup> 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sup>114</sup> 彼得·蓋伊(Peter Gay)著，梁永安譯，《史尼芙勒的世紀：布爾喬亞經驗一百年·一個階級的傳記 1815-1914》(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頁 221-222。

類似的焦慮情緒也可見於當時的中國，特別是可見於扭轉閩浙兩軍對峙局勢的湯執中此人。很清楚地，雖說湯執中有壯志未酬之憾，但其實他的經歷與決斷也預示了 1928 年後強調反帝民族主義的黨國體制在地方政治中的興起。但從 1924 年地方菁英對溫州兵災處理過程的討論中，並落實到對地方社會中實際生活的不同人群的討論時，專研心理史學的蓋伊所言的資產階級並不同於活躍於東南沿海地方政治領域中的地方菁英。透過本文對溫州戰場的微觀地方政治史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晚清以來的地方菁英所代表的民間力量，已經是靈活地運用地方社會中因不同時間所出現的不同資源，也包括國際網絡資源，去結成聯盟為地方社會的發展提供保護與發展的機會，充分地揭示了多元民間自主性與不同人群間的合作在地方政治與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角色。透過本文我們能對 20 世紀中國東南沿海的縣級地方政治的運作實態，發展出新一層的理解。往後又如何從日常生活面去重新理解 20 世紀以來地方政治場域中各方勢力持續的競合關係，去重新反思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對地方社會生活所造成的衝擊，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問題。

##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 (一) 傳統文獻

- 朱景星、李駿斌，《閩縣鄉土志(全二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呂渭英，〈調查報告：福建金銀機關近年消長情形，福建商務議員呂渭英申報〉，《政治官報》，第68期(北京，1907)，頁18-19。
- 李興銳奏，〈奏為洋務重要請准將福防同知呂渭英暫緩送部引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故機160208號，頁1。
- 張桐，張鈞孫、戴若蘭整理，《張桐日記(全十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
- 張桐，張鈞孫等編，《張震軒選集之一：杜隱園詩文輯存》，香港：香港出版社，2005。
- 符璋，陳光熙點校，《溫州圖書館編：符璋日記(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
- 許應駟奏，〈奏為福建辦理水災賑捐出力之福防同知呂渭英試用縣丞陳文溥前各因功奏保在案特請分別改獎呂員請以道員用陳員請以直隸州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故機156107號，頁1。
- 童兆蓉，《童溫處公遺書》(民國寧鄉童氏椿蔭書屋刻本)，現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 黃光，馬允倫編，《溫州文獻叢書：黃光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 黃體芳，俞天舒編，《黃體芳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 載振等奏，〈奏為擬請將各省商務等局總辦差使酌由臣部筭充商務議員以資聯絡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故機162648號，頁3。
- 趙爾巽主纂，《清史稿》，臺北：鼎文出版社，1981。
- 劉紹寬，《果報征信錄》，收入陳瑞贊編，《東甌逸事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 劉紹寬、符璋主纂，《民國平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二) 近人論著

- 《浙江省宗教志》編輯部，《浙江省宗教志資料彙編》，杭州：《浙江省宗教志》編輯部，1993。
- 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4冊，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
- 孔飛力(Philip Kuhn)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方志剛，〈溫州天主教的起源〉，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第7輯，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頁339-342。
- 方豪，〈三十年來的中國天主教〉，收入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2536-2539。
- 王家儉，〈清末民初我國警察制度現代化的歷程(1901-1916)〉，《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臺北，1982.06)，頁301-366。
- 王曉天、王國寧主編，《湖南古今人物辭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平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陽縣志》，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3。
- 平陽縣慈善總會編，《慈心善舉：平陽歷代善人善事回眸》，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5。
- 朱維方，《溫州天主教簡史》，溫州：溫州天主教區，2006。
- 池子華，《紅十字：近代戰爭災難中的人道主義》，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3。
- 池子華、郝如一，《近代江蘇紅十字運動，(1904-194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 佐藤仁史，《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菁英與地域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 何文平，《變亂中的地方權勢：清末民初廣東的盜匪問題與社會秩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何品，〈權與錢的較量：1923年浙江地方實業銀行官商分股事件評析〉，收入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編，《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變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190-208。
- 何品輯錄，〈浙江實業銀行及其前身大事記，1908-1937〉，收入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編，《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429-431。
- 余振棠，《瑞安歷史人物傳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 佚名，〈辛亥革命剪辮趣聞〉，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第22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10，頁324-326。
- 李世眾，《晚清士紳與地方政治：以溫州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李正中，《近代天津名人故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 李東華、關玲玲、楊宗霖編，《一個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 李盛平，《中國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 李晴霞，〈從董若望醫院到溫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的變遷〉，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第9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5，頁148-151。
- 李曉晨，《近代河北鄉村天主教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 沈允德、陸雨之，〈解放前的溫州金融業〉，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第2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7，頁20-30。
-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著，郭偉全譯，《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 沈懷玉，〈清末地方自治之萌芽(1898-190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臺北：1980.07)，頁291-320。
- 佳聲，〈溫州與寧波的歷史關係〉，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第2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7，頁43-52。
- 孟森，《地方自治淺說》，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彼得·蓋伊(Peter Gay)，梁永安譯，《史尼茨勒的世紀：布爾喬亞經驗一百年·一個階級的傳記1815-1914》，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 金柏東編，《溫州文獻叢書：溫州歷代碑刻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 金普森、孫善根主編，《寧波幫大辭典》，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 金普森主編，《虞洽卿研究》，寧波：寧波出版社，1997。
- 郝建興、黃紅華、方立明等，《在政府與企業之間：以溫州商會為研究對象》，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纂，潘一平編，《浙江人物簡志》下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浙江省電力工業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電力工業志》，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5。
- 張朝暉等，《近代浙江地方銀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 張憲文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張憲文輯錄，〈甲申教案及拳民運動的幾則史料〉，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第9輯，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頁226-239。
- 郭劍林主編，《北洋政府簡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 郭慕天編著，《浙江天主教》，杭州：《浙江省宗教志》編輯部，1988。
- 陳方中，〈天津教案再探〉，《輔仁歷史學報》，第11期(新北，2000.06)，頁133-160。
- 陳方中，《崩落天朝的天國子民：義和團時期的直隸天主教會》，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17。
- 陳世奇，〈五四運動在溫州〉，收入張憲文編，《溫州文史資料》，第4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138-142。
-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書店，1980。
- 陳國強主編，《浙江金融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
- 陳錫璋，《細說北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 陶水木編，《近代浙商名人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時期史話》，北京：三聯書店，1983。
- 陸雨之，〈我所知道的楊雨農〉，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第3輯，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7，頁168-169。
- 游壽澄，〈黃梅僧和他的《話劫錄》〉，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第9輯，平陽：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頁36-49。
- 游壽澄，〈黃雲卿與黃泰昌的興衰〉，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第6輯，平陽：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8，頁38-40。
- 項崧，〈記甲申八月十六日事〉(乙酉，宣統元年，1909年4月作)，收入張憲文輯錄，〈甲申教案及拳民運動的幾則史料〉，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第9輯，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頁228。

- 馮烈鴻，薛紀權譯，張孝民校，〈溫州初印象：《傳教生涯：馮烈鴻神父的傳教日記選譯(1899-1928)》〉，收入方韶毅主編，《甌風》，第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頁20-33。
- 馮堅，〈楊雨農與溫州慈善事業〉，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第19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7，頁255-259。
- 馮堅，〈溫處道童兆蓉〉，收入潘善庚主編，《歷史人物與溫州》，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頁196-198。
- 馮筱才，〈江浙商人與1924年的「齊盧之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臺北，2000.06)，頁183-241。
- 馮筱才，〈江浙戰爭與民初政局之轉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34卷第1期，(杭州，2004.06)，頁54-62。
- 馮筱才，〈拖洋油箱：近代溫州鬧米風潮的儀式與政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上海，2016.07)，頁101-113。
- 黃伯蘊口述，孫孟桓紀錄，〈東甌電話公司創辦始末〉，收入張憲文編，《溫州文史資料》，第4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254-259。
- 黃鈞、徐希博主編，《京劇文化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1。
- 黃漢，〈法國遣使會司鐸馮烈鴻的溫州生涯〉，《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第34卷第3期(長春，2015.03)，頁48-49。
- 楊瑞津，〈緬懷祖父楊雨農〉，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第12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文史資料委員會，1998，頁339-344。
- 賈逸君編著，《民國名人傳(上)》，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2。
- 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閩南民軍：福建民軍資料選編》，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01。
- 蒼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蒼南縣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 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劉厚庄年譜〉，收入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第16輯，蒼南：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1，頁401-431。
- 趙尚為等譯，《近代溫州社會經濟發展概況：甌海關貿易報告與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 劉錚雲，〈金錢會與白布會——清代地方政治運作的一個剖面〉，《新史學》，第3卷第6期(臺北，1995.09)，頁63-94。
- 潘猛補編，《呂渭英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1。

- 蔡鋼鐵，〈趙保祿主教在溫二三事〉，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第15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3，頁44-47。
- 鄭頡峰，〈近代前來溫州的外國傳教士〉，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鹿城文史資料》，第17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4，頁189-196。
- 鄭頡豐，〈溫州天主教會三大善事〉，收入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鹿城文史資料》，第3輯，溫州：溫州市鹿城區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頁123-126。
- 蕭公權，張升、張皓等譯，《鄉村中國：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 蕭耘春，〈周仲祥與南港水利〉，收入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第2輯，蒼南：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6，頁56-61。
- 謝擁三，〈周宅祠天主教本堂概況〉，收入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溫州文史資料》，第7輯，溫州：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頁336-338。
- 瞿同祖，范忠信、晏鋒等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 羅士傑，〈大眾組織與晚清地方政治——以1900年浙江溫州的神拳會事件為討論中心〉，《新史學》，第28卷第2期(臺北，2017.06)，頁187-224。
- 羅士傑，〈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臺北，2012.03)，頁159-202。
- 羅士傑，〈近代溫州的龍舟競渡與地方自治傳統〉，《歷史人類學刊》，第17卷第1期(香港，2019.04)，頁31-65。
- 沈懷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輸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臺北：1979.10)，頁159-182。
- 關玲玲，《許崇智與民國政局》，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 蘇萍，《謠言與近代教案》，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 (三) 西文專書及論文：

- Cheng, Linsun, *Banking in Modern China: 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 1897-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Fuller, Pierre. *Famine Relief in Warlor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Goossaert, Vincent. "189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 no.2 (2006): 307-335.
- Lary, Diana. *Warlord Soldiers: Chinese Common Soldiers,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Linsun Cheng, *Banking in Modern China: 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 1897-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o, Roger, Shih-Chieh (羅士傑). "The Order of Local Things: Popula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Modern Wenzhou, 1840-1940," Providence: Ph. D. dissertation, Brown University, 2010, ch.3 "Wenzhou and Christian Impact: Harbinger of New Political Order (1870-1900)".
- Martin, Bra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McCord, Edward A.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Mungello, D. E. *Catholic Invasion of China: Remak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 **Civil War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ocal Elites' War Mediation in 1924 Wenzhou, Zhejiang**

Roger Shih-chieh L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multiple civil wars among different military strongmen became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examinations of the impact and damage that these numerous wars had on ordinary people's daily lives. Besides examining the military outcomes of these war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civil war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It will ask how local elite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generations worked together to protect their communities from the man-made disaster of the war. It will show that in the case of Wenzhou, local elites successfully protected their city.

The article uses Wenzhou's local archives to show how different local elites cooperated to mediate the crisis caused by a battle between two military strongmen in 1924. The article will also show that this group of local elites included political activists, retired Qing officials, former bankers, merchants and the Wenzhou Catholic church. By reexamining the two warlords' battle in Wenzhou in 1924, we can use this case to better understand local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Local politics, local elites, Catholic Church, Huang Guang, Lu

**Wen-chih**

